

毛泽东与《红色中华》报

□ 邱明



《红色中华》报漫画

《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是在毛泽东悉心指导下创办的，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央苏区发行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舞台。

毛泽东亲自筹办《红色中华》报

毛泽东认为，不仅要打破敌人军事“围剿”，还要突破新闻封锁，打破敌人文化“围剿”。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利用缴获敌军的电台和投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创建了无线电通讯部队，并同步筹办新闻通讯社。1931年11月，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宣告诞生。红中社以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兼作通讯社业务，报、社合一，后设新闻台，收集国内外电讯，编印参考消息，向全国播发无线电明码新闻。

毛泽东挑选了周以栗、王观澜等精干力量组成编辑队伍，明确了办报宗旨和任务，把《红色中华》报作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名片来打造。《红色中华》报在1931年12月11日创刊后，由项英具体分管。毛泽东一直密切关

注报纸发展，工作间隙经常到访红中社，指导办报工作。《红色中华》报积极宣传政权建设，服务革命战争，出色完成了党和政府赋予的任务。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办报成绩：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了。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书法雄健有力、豪迈洒脱，成为《红色中华》报的品牌标志。

毛泽东是《红色中华》报的重要撰稿人

毛泽东积极为《红色中华》报提供了大量稿件，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中供稿最多者。据统计，该报刊登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或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200篇左右。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等名义发表的政策文件，共约172篇，包括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各种条例、训令、指令、指示、决议案及对重大问题发表的社论等，反映了红色政权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建设情况；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6篇，集中反映了他对战争

动员、经济建设、查田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调查和思考；毛泽东所作的会议讲话、报告、结论共约10篇，主要是他在重要会议的讲话和报告；毛泽东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发表谈话6篇，内容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行径等；毛泽东领衔联名发表书信3篇，主要内容是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的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调查严谨，内容翔实，思想深邃，一针见血，成为《红色中华》报革命的旗帜，引领了苏区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红色中华》报生动展现了毛泽东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是《红色中华》报重点报道的对象。据统计，毛泽东在该报的相关报道达到40多次，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中报道次数最多的。

新闻生动展现了毛泽东的领袖形象。毛泽东凭着高瞻远瞩的智慧、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带领苏区人民披荆斩棘、开创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新局面。新闻中描述，毛泽东在贫农团代表、少先队员、红军家属等会议活动的讲演中，常常用通俗的语言和质朴的辞藻，阐述深邃的道理。与会代表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不时被诙谐语句引得哄堂大笑，不断地喊出热烈的口号。这些新闻细节充分地展现了毛泽东与广大群众水乳交融的领袖魅力。

新闻重点报道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红色中华》报在1933年纪念“八一”的特刊和文艺副刊专号中，刊文回顾了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并以诗歌、独幕剧、小说的形式，歌颂朱毛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光荣历史，表达了苏区军民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新闻凸显了毛泽东的智谋韬略。毛泽东雄才伟略，足智多谋，经常将新闻媒体巧妙运用于革命斗争当中。1934年8月，中共中央出于战略意图

考虑，宣扬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毛泽东接受了《红色中华》报记者专访，并在瑞金“八一”阅兵典礼和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演讲，宣扬抗日先遣队将经东部省份北上抗日。《红色中华》报连续50多天集中报道抗日先遣队胜利的消息。在新闻“烟幕弹”迷惑下，抗日先遣队引起国民党当局恐慌，引来敌人重兵围堵，从而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赢得了宝贵时间。

《红色中华》报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践舞台

《红色中华》报从创办之初，就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斗争、指导工作。毛泽东日后形成的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反对“党八股”等新闻思想，都可以在《红色中华》报中找到发展的雏形。可以说，《红色中华》报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舞台。

一是党报是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毛泽东把宣传工作当作“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主张“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把报刊当作“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可以起到一枝笔杆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作用。《红色中华》报吸收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主要思想，在办报宗旨上，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在办报风格上，呈现出战斗性、突击性和鼓动性的鲜明特点。

二是党报要坚持党性原则。毛泽东认为，党报的功能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给群众，使群众了解党的正确主张，从而扩大革命的影响力。《红色中华》报忠实坚守了党性原则，新闻报道体现出坚定的阶级立场，宣传了党的知识理论，积极发挥了“喉舌”作用，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声音和各项方针政策准确、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具有号召力和权威性。

三是党报要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党报的服务对象是群众，必

须依靠全党的力量，发动群众来办。《红色中华》报贯彻了这一思想，新闻内容与群众密切相关，宣传方式让群众易于接受，新闻编排符合群众阅读习惯，坚持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党政军群等系统中发展了400多名通讯员。

四是党报要调查研究。毛泽东崇尚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红色中华》报在毛泽东指导下，参加查田运动调查研究，为中央起草了解决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文件。该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蔚然成风，经常组织开展调查研究的新闻竞赛，指导通讯员学习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五是党报要遵从新闻传播规律。在毛泽东倡下，《红色中华》报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不编造虚假新闻，不传播谣言，树立权威性，增强公信力。坚持新闻时效性原则，从每周1期发展到每周2期，再到双日报，增设“最后来电”栏目，第一时间刊发前线红军胜利的消息，在新闻传播上赢得主动。运用简朴生动的文风，广泛运用方言、俚语、俗语、白话，刊载山歌，贴近群众。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开设了“突击队”“警钟”等栏目，大力反腐倡廉，批评揭露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不正之风，在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苏区群众的广泛好评。



《红色中华》报

海坨山精神永在 潮白河万古长流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孙希磊

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位于北京延庆龙庆峡入口处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馆内。纪念馆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由烈士纪念碑和抗战纪念馆两部分组成。纪念碑于1989年10月落成，是纪念馆的地标性建筑，高耸挺拔、肃穆雄伟。碑座是花岗岩石砌地的瞻仰平台。碑身是由净高14.2米、宽6.3米的一块巨型碑心石组成，其设计造型为刺刀、步枪的象征形态，寓意平北广大军民和革命先烈奋勇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气概，象征着抗战民众用热血铸成抗战铜墙铁壁。碑体正面镌刻着聂荣臻题写的“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鎏金碑名，背面为彭真题写的“平北抗日烈士永垂不朽”题词，碑文为苗培三撰稿、刘炳森书写，全文如下：

巍巍海坨山，雄伟险峻，林密谷深。荡荡潮白河，源远流长，物产丰饶。乃当年平北军民，坚持八年抗战，赖以依托之地。平北抗日根据地，以赤城、延庆为中心，北至沽源、宝昌，南达昌平、顺义，西临张家口，东近承德市。境内崇山峻岭，横跨长城内外，地处满洲、蒙疆、华北伪行政区结合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敌我必争之地。

1938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东征冀东，在平北播下抗日火种。1940年春，根据我党“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之战略部署，我平北游击大队挺进军第十团开进平北，抗日政权党群工作亦随之建立。平西、平北、冀东连成一体，将敌伪统治下之北平、承德、张家口皆置于我打击威胁之下。

平北抗日斗争异常残酷，尤以1942年最为艰难。日寇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之“三光政策”，“强化治安”，“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在庞家堡，日寇屡次制造血案，屠杀我矿工27000余人。平北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为坚持抗战取得胜利付出重大牺牲，仅城关、赤城两县，每6人就有1人为国捐躯，优秀指挥员十团团长白乙化光荣殉国，中共昌延县委书记徐智甫、丰滦密县长沈爽身陷重围，壮烈牺牲。连长谢瑞沙场浴血，当代余太君邓玉芬毁家纾难，献

出丈夫、爱子7人。民兵英雄何金海大摆地雷阵，威破敌胆。凡此气壮山河之英雄业绩不胜枚数。抚今追昔，慷慨悲歌，无愧于中华民族之魂。驱走严寒冬雪，迎来春暖花开。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平北军民奉命攻克张家口、宣化、新保安塞上重镇，配合苏蒙联军，光复张北、多伦、察哈尔盟等沦陷国土，切断平绥铁路，为解放华北，进军东北，做出贡献。

际此建国40周年，原平北各县政府和原领导诸老共议，于海坨山下，龙庆峡前，树立抗日烈士之碑，以缅怀先烈，激励来者。

海坨山精神永在，潮白河万古长流。

一九八九年七月

这篇碑文是纪念碑的“点睛之笔”，不仅高度概述了平北抗战的光辉岁月和斗争经历，凸显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而且彰显了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驰骋于长城内外，转战在平北大地，在巍巍的海坨山下，宽阔的潮白河畔，谱写下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凯歌。

平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敌我必争之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赴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争。1938年5月，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集结，经平北的康庄到延庆四海县，再到怀柔沙峪，挺进冀东，策应武装暴动，在平北地区首先播下抗日火种。6月，建立滦昌密临时县政府，组织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夏，八路军再次挺进平北，11月，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八路军挺进部队根据上级指示，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构想，采取“点线突击”“梯次渗入”的战略战术，稳步推进，平北抗日根据地逐渐稳固；1940年1月，成立中共平北工作委员会，组成平北游击大队进驻了以延庆沙塘沟为中心的后七村一带，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斗争；之后，先后成立了平北军分区、中共平北地委和专员公署，同时，平北根据地还建立了敌后抗日政权，在领导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横跨长城内外，深入敌后战场，地处伪满洲、伪蒙疆、伪华北政权结合部，以赤城、延庆为中心，西靠近张家口，东逼近承德、山海关，北抵沽源、宝昌，南临昌平、顺义，犹如插在敌人腹心的一把钢刀，对日伪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平北抗战艰苦卓绝，抗日英雄气壮山河

在纪念碑的碑文中，凸显了“同

仇敌忾，众志成城”的立碑主题，重点描绘了平北抗战中，面对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身处艰辛困苦的敌后战场，在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奋战，为坚持抗战取得胜利付出重大牺牲，涌现出众多气壮山河的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一是率领八路军深入平北，进行浴血奋战的军队指挥员。碑文中提到的白乙化、谢瑞即是其中的代表。1939年春，白乙化率队从内蒙古来到平西，与冀东的抗日联军合并，组成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任副司令员，1940年1月，抗日联军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任团长，即率部进军平北，路经沙塘沟，伏击日军，歼敌300余名，声震平北，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1941年2月，率部在密云马营与敌人激战，毙敌117人，在战斗即将胜利结束时，白乙化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30岁。

谢瑞是晋察冀军区40团2连长，著名的战斗英雄。1944年4月，他的连队为掩护龙关、崇礼、宣化联合县干部转移，在敌强我弱之下，利用山地与日伪军展开战斗。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英勇奋战，连续击退攻击，胜利完成掩护任务。他率领的2连被晋察冀军区授予“长城中队”荣誉称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长城中队的旗帜在战旗方队中通过天安门广场。

二是坚守平北根据地，带领群众坚持斗争牺牲的地方干部。沈爽（1896—1942年），字子儒，化名白涤飞，满族。他于1931年入党。九一八

事变后，东北沦陷，曾组织抗日武装，后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斗争。1941年调任丰滦密联合县长。1942年4月8日，日寇对华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沈爽在河西地区的臭水坑战役中壮烈牺牲，时年45岁。徐智甫（1907—1940年），原名徐睿，蓟县人。1932年入党，1938年参加冀东大暴动，历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6总队政治副主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党校教务主任，昌（平）延（庆）联合县委书记，1940年8月27日晚，徐智甫同县长胡英在黄土梁村工作时被敌人包围，突围中不幸牺牲，年仅32岁。

三是被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广大民兵和群众。碑文中提到何金海（1925—1947年），即是其中一例。1944年，龙延怀交界的十几个村庄约300名民兵组织起来，成立“红石山游击队”，何金海为队长。7月，他带领游击队袭击矿山，打击日寇汉奸，并解救劳工，被平北地委和军区授予“一级民兵战斗英雄”称号。解放战争中，何金海带领县大队和民兵赶赴前线，1947年8月，他带领两个中队反击还乡团，为掩护大队人马撤退，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邓玉芬（1891—1970年），是北京密云县张家坟村人。抗日战争中，她积极参加抗



日工作，掩护和护理八路军伤病员，被八路军指挥员尊称为“邓妈妈”，她舍家纾难的英雄壮举，被誉为“当代的余太君”。

碑文虽短，言简意赅，但蕴含的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却是深远的。我们要永远铭记那段民族危机的艰难岁月，铭记无数民族英烈和革命志士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作出的杰出贡献。抗战期间，位于敌后战场的平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统治最严密、斗争最惨烈的抗日前线，平北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为坚持抗战取得胜利付出重大牺牲。正如碑文中说到的“仅龙关、赤城两县，每6人就有1人为国捐躯”。反映了平北人民英勇不屈、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